

第一章

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社会体系的变动

第一节 国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变动

当今世界政治的转变如此迅速、彻底、复杂多样，以致于许多分析家感到茫然无措。“历史经常拿我们的愿望或期待开玩笑。1989年的事件也许比1945年以来任何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都更受欢迎，但却是人们始料不及。分析家们对80年代所作的许多预测，并不乐观。”⁽¹⁾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说出：变动中世界政治的现实如何；在没有搞清世界政治重要的发展方向的情况下，我们的生存条件会怎样；我们如何解决和克服各种各样的全球问题。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世界政治超越了人们的认识框架不断发生着变化，但似乎人们不会对变化的内容、意义、方向达成共识。即使一些概念的具体意义相当复杂，但是“冷战的终结”、“世界新秩序”、“历史的终结”、“后现代社会的出现”、“历史的转折点”等等词汇，表明了当今世界政治处于急剧变动过程之中。国内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内容与意义正在发生着变化。“跨越国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联系，决定性地制约着生活在国家内的人们的命运”。⁽²⁾国际政治的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全球化进程使国家原有的坚固疆界逐渐变得没有意义，并且导致不断变化的生活模式的趋同之势。⁽³⁾

世界政治现实的不断变动，致使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不能准确地描述、正确地解释、恰当地预测如此重大的转变。无疑，国际关系的“变动理论”还没有完善，仍然是不完备的。甚至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或模式，能够概略地预见到冷战的结束。目前，约翰·L·盖迪斯正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它们对国际关系未来进行预测的能力。这些理论包括现实主义方法、行为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和演化论方法。他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预测未来；导致这些理论不能预见冷战结束的原因，可能在于它们自身是冷战的产物。⁽⁴⁾尤其是作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没有能够预测到最近发生的转型过程和结果，这不仅意味着现实主义理论不能有效地预见冷战的终结，而且也意味着它不能准确地描述、正确地解释冷战的现实与变化，以及变化中的国际体系。因此，冷战的终结令缺乏有效分析框架的世界政治研究者们猛然一惊，这当然是很自然的。

的确，自冷战结束以来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描绘有关世界政治的适当前景。现实主义理论并不能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全球体系形态。当然还有许多因素造成现实主义者不能准确地描述、正确地解释、恰当地预测变化中的全球体系。特别是国际关系的变动理论，几乎没有发展成型，仍然是不完全的，以至于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预测和解释冷战结构的过程和终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重新认识一个混乱、不确定和无规则的世界时，在认识一个无从进行预测的世界时，我们有些力不从心。⁽⁵⁾

尽管我们可能很容易区分不同情况，但仍必须认识到普遍存在的理论困境，现存理论本身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变化中国际体系的现实。理论与变动着的现实之间的差距也因此不断扩大。我们缺少有关国际关系总体变动的理论。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缺少变动框架。

正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使之不仅不能理解、

解释变动着的国际关系现实，而且也不能理解和解释其它重要的问题。由于缺少变动理论，致使那些过于简单的理论在分析复杂的全球体系的不同侧面时，一筹莫展。詹姆斯·罗斯诺强调：

“人们只能面对那些分析家而自叹不如，他们或是通过假定所有行为体都恣意追求权力的最大化，来解释重大事件的过程，或是把现代国际关系历史归结为安全 and 经济利益的冲突，或是把所有原因归结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需求；他们或是利用国家体系所提出的要求，推导出一个宽泛的解释框架，或是借助某个主导变量，解释战争的长波规律。这些五光十色的理论视角为了解全球生活的性质，提供了丰富而深入的洞见。所有这些理论都采纳了某种通行的秩序，但却都不能充分地解释造成我们时代动荡的变量。理论上的狭隘使它们对事物的解释过于简单化。这些贫乏的理论最终囿于限定，不可能不忽略宏观和微观的多个层次上不断激发和积蓄能量的动荡之源。”⁽⁶⁾

缺乏变动理论可能造成这样的现实，即理论通过自身的假定，在一定意义上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由于现实主义理论这种自我实现式预言能力，它一直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或许这些理论本身借助其理论框架部分地创造了国际关系现实。正如现实主义一向指出的，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任何理论必然反映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因此最需注意的是，即使缺少变动的理论框架，我们也必须理解变动着的现实。而且，我们不得不弄清政治、经济和其它力量自身的情况，通过主观行为来理解变动及其未来，决定如何建设一个新时代，最终赋予当前的转变以应有的意义。以世界秩序为例，不理解当今的变化，不对未来进行构思，就不可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牢记如何理解变动中的世界秩序。⁽⁷⁾我们应该建立有效的世界政治变动理论。实际上，世界政治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一直在快速地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动，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创建正确的世

界政治变动理论。

世界政治中众多跨国家行为体的出现、民族宗教问题的集中爆发、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高涨、人口爆炸、原教旨主义的复兴、艾滋病、难民、环境破坏等全球性问题的增加，以及国际体制的衰退、对和平与社会（社会生活）的威胁不断增长，这一系列问题日益普遍化。像海湾战争、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非洲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以及前苏联的核武器扩散等现象，代表着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转变中的力量，离有效的世界机构的建成还相去甚远。⁽⁸⁾

考虑到这一连串现象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扩展、密布到整个全球，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在显著地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关系（社会内部关系）与国际关系（民族国家间的关系）相比，前者在世界政治中应该占有适当的位置。“在当代历史上，社会关系的发展已经超越地方和国家的空间，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当代社会正是在这种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推定，国际关系对社会变动的过程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国际化、全球化可能影响到社会转型的方向、速度和程度。⁽⁹⁾

确实，社会变动大大加快了社会生活全球化（国际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的全球化意味着社会生活空间的扩展及其重要性的不断增大。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关系显著地扩展到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国际关系的转型密切地、直接地与社会变动的转型相联系，反之亦然。因此，没有一定的秩序，几乎不能发现这些变化。我们把国际关系看作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关系，认为国际变动类似于国家间关系的变动，这都是不对的。最根本的是，我们应该看到国际关系等同于社会关系，国际变动就等同于社会关系的变动。

社会生活的全球化，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价

值，或社会生活的问题在空间上和含义上已经全球化了。同时也表明，社会关系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球问题所左右。因而，南北问题的不断深化、核扩散危机、各种民族宗教问题、难民问题、恐怖主义、压制人权等，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突破国界，闯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为了分析当今国际关系的实质和特点，极其重要的是要以变化的全球历史的框架来认识国际关系。因此，“在这个新的世界上，等级差别开始被认为是性质种类的差别，共同利益的观念呈现出新的意义。日趋明显的事实是，尽管那些孤立的人们仍保持着彼此隔绝的状态，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共同利益与个别利益是不能分开的。”⁽¹⁰⁾ 权力、和平、正义、秩序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

然而在美国，一种可笑的国际关系理论似乎不想作任何改变而加以延续。这种理论竭尽全力把极其复杂的历史和政治现象简单化，把注意力非历史地集中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时代，集中在40年威慑平衡哲学与行为上。这种倾向也许妨碍了大多数人理解时代的最基本关系。⁽¹¹⁾ 为了解释全球社会生活或全球社会关系的真实内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传统全球权力关系的结构框架呢？采用原来简单的、表面化的理论，要令人信服地说明当代复杂易变和结构化的世界社会，是困难的。我们常常面对不明朗、不确定的世界政治变动着的现实感到困惑不解，就是因为采用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固定的思维模式。

要重建变动着的世界社会现实，需要同时对传统理论从根本上进行破与立两方面的工作。为了重建当代国际关系的变动理论，实际上我们必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出发点及其意识形态，因为每一种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的烙印。正如沃斯奎兹所指出的，强权政治作为被决策者接受了的世界蓝图，可能助长了某种行为，起到了自我实现式预言的作用。⁽¹²⁾

与现实主义理论不同，把国际政治理解为无止境地追求权力，增强了自我实现式预言的作用，并且很容易导致强权政治的结果。政治现实主义者的道德虚无论一般都植根于政治上狭隘的、固执的偏见，在国际政治中尤其如此。⁽¹³⁾以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理论所带来的最可能的结论，是“监视角色”“权力”“国家”“战争”“冲突”“稳定”等等，而不是“跨国家行为体”“问题领域”“可预测”“合作”“动力”等。一般说来，我们在世界上的所思与所为，以及理解现实的方法，即支持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和现象学问题，在国际关系学中被忽略、被曲解。现实主义对真实性质的意义与结构缺乏了解。“结果是：国际关系理论界继续束缚在高谈阔论的樊篱与政策分析的寄生状态的体制下。”⁽¹⁴⁾

国际关系现象尤其会表现为连续变化的现实。多数现实主义者借助 17、18 世纪的概念来分析结构的变化。他们选择了经验性概念和传统理论，以及前后矛盾但根却深蒂固得以维持的意识形态。他们试图维持一种特殊的、包罗万象的方法，以此来说明变动着的世界。由此，现实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维持现状特征。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勃兴正是针对这种倾向的。⁽¹⁵⁾

自然，世界政治变动着的现实不仅要求理论范式的变化，即破除旧的流行理论框架，而且要求在旧的概念中补充新的内容。但现有的主流理论模式总是试图把世界政治变动的现实，牵强附会地解释为从过往沿续而来的现实。国际关系理论的这种故步自封状态使其忽略，并误解了世界现实。由于回避了那些与其理论框架不符的现象，他们从而有效地重新构筑了非常规现象、现存主流理论的合法性。然而，“理论范式的变动不仅在智力上突破了主流理论模式的限制，而且理论范式本身也发生了革命；它们从世界政治的转型中汲取能量。”⁽¹⁶⁾不过，旧的主流理论与新的范式相比，有时仍会占据优势。

从历史的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假定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科学或哲学的人类思维活动，都开始于并且一直重复着同样的活动。最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往往产生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但这一事实并不说明范式、理论和哲学能够解释变动自身。没有什么理论能够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世界社会由状态 A 向不同的状态 B 的根本转型，也不能解释现实变动的实际情况、机制、意义和方向。当然，某些理论也许能够成功地描述和解释世界政治变动的局部。很明显，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是围绕着权力、扩张、争夺霸权、超级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国家安全等冲突思想体系的顽固观念发展起来的。⁽¹⁷⁾

同时，冷战也确实受到了公民、公共舆论、社会运动、国际组织、中小国家和推动国际关系的其它力量的影响。这导致了军事力量、权力争夺与核战争危机的减弱，并对其有所控制。我们不能轻易地同意核遏制战略有效地阻止了美苏核战争的观点。反之，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民众、公共舆论、反战运动、国际组织以及不结盟运动的有效压力。十分明显的是，这些力量自身成为积极的因素，有助于打破冷战的局面。今天，国际关系中一些活跃的重要力量，使民众自身有可能在实际中采取不同于以往时代的行动。

尽管这些微小的变量也许不足以解释全球秩序的原则，但确实显示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力量来源。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重建一种能够适当地融合各种因素的理论。重建世界政治的变动理论，实际上意味着重建国际关系自身。最重要的是，我们经过努力能否形成一种理论，使之能够深入变动中的现实，即被当前研究目标排除、否认、抹煞或忽视的那些现实。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权运动等等，正在尝试着回答与变化有关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思想上不考虑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中随时间而来的连续变化问题提出质

疑。⁽²⁰⁾ 我们应重建何种理论框架以正确地认识和解释全球体系变动着的现实？这就是说，要正确地理解变动着的现实，就必须认识原有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存在的实质问题和根本局限性。如果现实主义理论不能再准确地描述、正确地解释和恰当地预测变动着的世界政治，它就失去了有效性。无疑，应该寻求一种能够代替现实主义的新范式。如果理论本身不能适应变动着的现实的条件，它就会失去或削弱自身的生命力。

本章的目的是探讨如何分析和解释全球现实变动的意义，如何重建分析和解释这些现实的必要的理论框架。其次，我们应站在世界政治全球变化的角度，来考虑和批判传统的、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第三，着重关注与全球体系变动分析相关的理论问题，探讨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第四，我们要搞清世界政治、全球现实的变动意味着什么，以及从变动的观点出发，重建国际关系现实为什么是必要的。第五，我们提出一个全球社会体系的变动模式，以认识这一变动的本质和特征。⁽²¹⁾

第二节 现实主义理论和社会变动

首先，要重建社会变动理论，尤其要不断破除旧的实证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所描述的变动框架。正如R. 吉尔平所提出的那种观点，即认为虽然国际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并没有变化。他强调：“这是基于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千年不变的假说之上的。国际关系仍是独立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下对财富与权力无休止的争夺。”⁽²²⁾ 国际关系的根本变化是什么？这种假定的国际关系基本性质的延续性与全球变动之间有何联系？如何证实国际体系这种稳固不变的延续性？

现实主义理论偏重于权力、战争、冲突以及大国之间的关系，忽略或轻视亚洲、非洲新兴国家的团结及其力量；忽视石

油、铜等资源的重要性，以及国际公众舆论、和平运动、国际体制等等的影响和制约世界政治发展方向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是世界政治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当国际关系发生变化时，人们并没有对权力均衡，或随世界政治变动而来的权力（力量）分配结构上的变化给予更多关注。既然国际社会的目标是通过必要的权力分配结构维持稳定，那么毫不奇怪，国际关系就不会涉及变动的课题。“现实主义不把解释变动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如果不是出于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把权力看作国家和国家行为中固有的因素，看作是外交政策的目标和一种可解释变量。”⁽²³⁾

一般说来，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倾向在于强调国家至上、政治至上、归纳法和连续性。⁽²⁴⁾通过在理论上解析现实的变动是如何从诸多特征中抽绎出来的作法，我们应该认识到，现实主义理论从根本上忽视理论体系，排斥现实的变动。下面通过分析现实主义的三个主要假设，我们来看看变动在现实主义中的地位。

(1) 主权民族国家支配国际体系，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就是说，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

(2) 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竞争性的，虽然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并不排除合作的可能性。

(3) 在这样构成的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地追求权力和物质财富。⁽²⁵⁾

重要的是必须指出，把国际社会看作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体系，几乎就等于否定社会变动的重要性。作为以民族自我利益为取向的行为体，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世界政治被设想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实际上的无政府自助体系。没有更高的权威可以控制国家的行为，约束国家间的互动模式。而且，现实主义理论人为地强行将变动着的世界政治纳入二分法概念。“现实主义以所谓概念的‘正确性’人为地将无政府的国际事务区分为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本质与表现、内部与外部、初

级与次级、过去与现在等等，以此使其核心专业术语‘适应’了现实主义的‘事实’”。⁽²⁶⁾而且，“由于缺乏等级结构，人类注定要永远重复扩张与衰退、战争与复兴的周期”。现实主义强调国内与国际社会的根本性差别。⁽²⁷⁾

在以往的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主导行为体，这样讲并非夸大。而且，国家被认为是国际体系中理性的、统一的政治行为体。换言之，任何国家都采用同样的行为方式追求国家利益。由此，只要作为个别国家的性质与其行为方式保持不变，即便全球环境有所变动，国际关系也不会发生变动。

在现实中，国家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同质的行为体。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是，国家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各种国内条件的影响和控制。结果是形成并发展了特定的国际关系，不再是国家，而是跨国行为体（社会实体），跨越国界，形成频繁的互动关系。即使是现实主义也意识到后者的存在，但这些行为体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反常现象，是从属于国家行为体的。只要主权国家被看作世界政治中独一无二的行为体，只要由它们组成的国际体系被视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我们就找不出社会变动的可能性。在现实主义看来，任何国家都表现出类似的行为方式，构成了国家与国家间类似的交往方式，并建立类似的国家间关系。不考虑国内因素，我们就不能认识社会变动，结果只能是简单重复同样的国际现象。因此，尽管人们认为国际关系对世界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但国内因素从未被当作世界政治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力量。⁽²⁸⁾在一定程度上，不同因素、运动和集体行为可能影响国际关系，并带来变动，绝非偶然。

由于无政府体系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它本身必然包含着变动因素。而现实主义者所设计的无政府体系却是一种永远不可改变的状态。显然，无政府体系包括合作、体制、机构和一体化现象，也包含着缺乏权威性管理实体的状况。这表明国际体系中存

在着既定的稳定秩序，它可以使不同的行为体按照有效规则确定共同的行为方式。

根本问题在于，现实主义理论把国际社会理解为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²⁹⁾。应当看到的事实是，多数针对现实主义的批判理论，都没有批评把国际社会视为无政府状态的不言自明逻辑，这是令人奇怪的。虽然无政府的假设显然含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但在分析国际体系时确实有一定能力，这种立足于秩序与混乱、政府与非政府的二分法教条，从根本上支配着国际关系理论。秩序与混乱、无政府与国家、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权力与道德、经济与政治等等二分法的逻辑，意味着它们构成了互不相容的关系。尤其是，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现象与国内社会政治现象截然相反，更容易采用无政府标准来加以解释。一般性地把国际政治假设为无政府状态，而国内政治是有序状态，很容易使上述二分法合理化。

这种二分法可以解释世界政治的局部，但不能阐明它的整体现象。而且，它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忽视世界政治的性质。更确切地说，实际上是世界政治的本质构成了各种力量间的辩证关系，如秩序与混乱、权威与暴力、权力与道德、一体化与分化、冲突与合作等等。两极（力量）之间的关系会带来全球变动。结果，二分法本身不是带来变动的力量，凭借它我们也不能理解全球政治变动着的现实。二分法一直是实证主义理论的一大本质特征。尤其是自 18 世纪启蒙时代以来，自然科学一直受以二分法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的引导，变动着的现实显然被置之不顾。二次大战以来，二分法依然在美国国际关系领域中找到了其强有力变种形态，严重地束缚了变动理论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韦伯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把思辨的欧洲观念带入盎格鲁-美利坚民族的思维中。“然而，韦伯思辨的现实观不过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关系中实证主义的封闭倾向。”⁽³⁰⁾

现实主义理论的第二个假设，与变动着的全球现实之间是何种关系呢？既然国际社会被认为是无政府的状态，那么国际关系典型地表现为争取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只要没有一种秩序或权威实体能够控制主权国家的行为和相互交往方式，那么围绕国家生存、安全、独立和利益的斗争便会永远持续下去。或者说，国际关系的现实是以冲突结构为核心，众多国家价值之间处于互不相容的状态。正如罗斯诺指出的，对于现实主义理论来说，国际关系的现实昭示了这样的事实，即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将自己投入到无休止的争斗之中。“权力对于生存或继续战斗来说是必要的，所有国家都是潜在的敌人……但可以通过清醒的外交，或借助所有相同的行为体对国家行为抱有相似看法这一事实，来避免最坏的情况。”⁽³¹⁾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理解了变动着的全球体系的所有现实。A 国与 B 国陷入了权力之争，而 A 国与 C 国的合作关系仍能持续下去，这不是偶然现象。虽然 A 国与 D 国是潜在的冲突关系，B 国与 C 国仍可延续其合作关系。而且，A 国与 C 国可发展类似的灵活外交。A 国与 E 国之间似乎也有类似的关系。主权国家与跨国行为体能否形成权力关系、冲突关系或共同行为的模式，尚不得而知。

国家间关系的种种现实虽然主要被看作是政治性的，即不过就是战争、冲突和权力过程的重复，而不是国际关系的转型过程。从现实主义看来，似乎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不能涉及那些造成权力、冲突和战争等力量削弱的变动。然而，国际关系的转型毕竟意味着国际体系层面上权力的发展过程，至少是国家间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动。虽然争夺霸权的战争在国际体系的变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可能仅仅是同一层次的变动趋势。罗伯特·吉尔平提出了如下的解释：

“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是由政治对手争夺霸权引起的；这

些周期性的冲突重塑了国际体系的秩序，推动历史向新的、前所未有的方向前进。它们解决了由哪一个国家支配国际体系的问题，同时也决定了何种思想与价值观将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各个时代的信仰是什么。这些战争的后果影响了每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同时也影响了更大范围的国际体系结构。”⁽³²⁾

现实主义理论把国际现实归纳为权力、战争和冲突，却忽略了文化、宗教、经济、道德在变动着的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它把社会变动理解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我们很难发现国际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动的机会。在国际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理论忽略了引起国家行为和互动模式发生变动的现实。现实主义不仅忽视了影响国家行为和互动模式的各种因素，也忽视了导致变动的各种因素。由于局限在权力、冲突和战争的框架来理解国际关系，造成现实主义者实际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既然权力的角逐、冲突和战争的产生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即便不改变无政府结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由于新现实主义坚持国际政治的不变结果，以及不可改变的超常稳定结构性质，使之成为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理论。这对国际历史的研究造成了特别有害的影响。”例如，新现实主义理论不能处理如何达到平衡各种战略选择，不理解不同行为体的功能与角色，也不能真正历史地理解均衡行为和权力均衡自身。⁽³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为。国家间物质能力的分配是理解世界政治的关键因素。”⁽³⁴⁾但这种观点使我们难以认识当前全球体系的结构性转变。正如 A·温特强调指出的，世界政治是由社会构成的；国家行为是由社会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决定的；社会结构有三个因素：共享的知识、物质资源和实际措施。⁽³⁵⁾

现实主义理论的第三个假设同无政府假定一样，也是建立在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二分法基础上的。如上所述，导致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产生差别的主要原因，就是国际政治缺乏政府或秩序，而国内政治具备这些条件。既然国际政治在理论上是以无政府的假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那么国际政治必然被视为不同于国内政治的政治模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对称的。这两种政治各有自己的机制，各自服从不同的规则。如同台球游戏一样，在无政府的体系中，每一个国家需要相同的目标、相同的行为和相似的对外关系。

既然主权国家具有相似的性质，采取同样的行动，所以没有国家可以向国际体系作出不同的承诺，对国际体系产生特殊影响，或者采取某些措施推动国际体系的变动。因此，在无政府体系下，所有国家都受制于权力结构、冲突结构和战争结构，结果只能是追随同样的行为模式，组成相同性质的国际关系。

在零和游戏的逻辑控制国际社会的情况下，核心问题在于能否在国际关系中建立秩序。在最稳定的国际体系中，世界国家或全球利维坦也许会在各个国家头上强加一种秩序。第二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全球帝国或霸权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能够控制其它国家，维持令人满意的国际和平。折衷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寻求权力的均势（恐怖均势）。⁽³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只要零和游戏（无政府状态）主宰着国际社会，这种状态本身不会自动改变。零和游戏似乎将永远持续下去。但是正和游戏的情况也必然存在。

应当指出的是，由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组成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分为两个部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变动。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我们能够发现三种类型。首先，一方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部分地保持着非对称性，另一方面，二者又在类似的机制下运作。第二，两个政治体系不是孤立地、无联系地存在的，它们构成了平行的关系，也就是说，它

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第三，两个体系不仅可以构成相互影响的国际关系，而且可以构成同步（纵向沟通或结构化）相互影响的国际关系。

我们以两个体系的权力为例，说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二分法是如何被简单地合法化的。两种政治的权力是一种数量的问题，而不是一种质量的问题；国际政治的权力与国内政治的权力相比，有更多的机会成为一种强制性因素。另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存在着各种相互影响、难以分隔的关系。从国际体系到国内体系，从国内体系到国际体系，再从国际体系到国内体系……循环往复，这些连锁反应在社会两个层次上产生了整合与分散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内战、革命、国际战争、国内冲突、国际合作、国内反应和国内社会结构的转型等等都是如此。而且，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有所行动时，它们必然在两种结构之间以动态相互关系的形式运作。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国家行为与国际结构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二分法否认两个政治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

此外，我们应当指出另一个假设，即忽视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过分强调权力决定论的普遍性，导致这种对国际体系中的意识形态作用的忽视。“的确，现实主义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在减弱，意识形态只是一种掩饰，或是为了让追求权力合法化而作的道德包装。”实际上，现实主义者不能理解冷战时代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理解国际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实际作用。⁽³⁷⁾

既然现实主义有关国家行为的系统决定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国家对外目标的决策无关，那么可以断言，现实主义理论不能解释冷战的结束及其发展过程。正如 F·海利德指出的，我们应该把冷战看作两种不同的互不相容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体系内冲突。换言之，冷战应该从不同体系之间三种互动层次上理解，这

三个层次是：国家关系、社会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³⁸⁾从新现实主义的立场来判断美苏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两个国家都无视国内变动，力图维持两极体系。由于只注重能力，多数新现实主义者仍然坚持认为国际体系没有变动，无视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与新思维外交政策。⁽³⁹⁾

总之，现实主义理论的传统假设绝对没有能力准确地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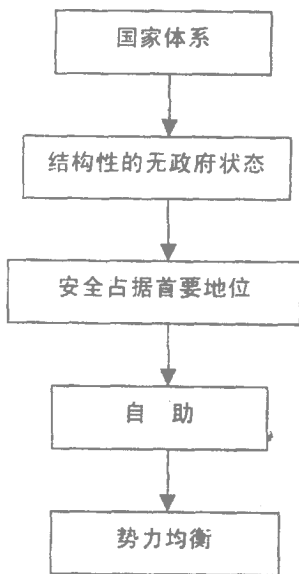


图 1.1

正确地解释和恰当地预测全球社会体系不断变动的现实。首先，这些假设是令人质疑的。它们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当今全球体系中的行为。不可思议的是，J·J·米尔舍莫勾画的现实主义有关国际体系全部精美的假设会是正确的，比如无政府体系、国家的军事防务能力、其它国家动因的不确定性、作为国家首要动机的生存问题、在国际体系中如何生存的战略思考等等，就难言正确。⁽⁴⁰⁾当然我们不能说，米尔舍莫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问题是他坚持认为，这些假设是跨越时空，永远正确的。如上所述，尤其是他所说的无政府的假设。在我们

把无政府状态看作是由自治体（国家）所构成的缺少政府的状态（混乱）时，我们可以同时把无政府体系看作是国家间体系：每个自治体如果想作为体系的一部分存在下去，必须把生存、安全和独立置于首要地位；每个自治体要服从自助的义务；国家间的权力的角逐造成各种权力均势模式的再现。图 1 说明了新现实主义一些假设之间的联系⁽⁴¹⁾。

如上所述，现实主义理论的无政府假设使它对包括冷战在内的全球政治的变动现实视而不见，忽略了全球体系中变动的力量。现实主义不能正确认识由行为体和结构之间辩证相互作用而带来的全球性转变。说到底，现实主义主要关注不能带来任何变动的非历史的延续性，它把变动着的现实看作反常现象略而不谈。

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同国家的现实政策紧密相关，这使它很容易忽略甚至排除哪怕是急剧的变动。简单地讲，原因在于美国外交政策利益与对全球变动估价的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因为现实主义主要关注于国家如何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以求能够对国际事件施加影响。由此看来，霸权的存在是必要的。现实主义用来解释世界政治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国家利益、权力最大化和权力均衡。实际上，这些因素是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必要条件是一致的。“通过表现其指导国家决策的能力，现实主义范式使自身的理论主张获得有效性。”⁽⁴²⁾

在现实主义看来，一旦无政府的秩序原则能够被等级制所取代，就会推动国际体系的形成。只要现实主义把无政府放在首要位置上，把它看作不可更改的大前提，那么在全球体系中促成变动，就相当困难。国际体系中无政府结构限制了国家行为体的行动，导致这一结构的永远重复。⁽⁴³⁾毋庸置疑，这只能造成体系结构的延续，而不是转型。

为了打开变动理论的大门，现实主义必须从二分法的逻辑中解脱出来。诸如混乱与秩序、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政治与经济、权力与道德等等二元化的分类，都使我们曲解了变动着的全球现实。换言之，现实主义理论通常仅仅限于认识过去的变动与将来的变动。只要国际关系只是简单地历史性地重复同异之间的特殊关系，变动的因素就很难在这种现实中扎下根来。“这种结构限制了人们的理性行为，从而体系的结构